

我参加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——郑其栋先生访谈录（节选）

时间：2009年12月16日 记录：崔鸿飞 魏志龙
地点：西城区郑老师寓所 整理：任福佳 孟洁
受访人：郑其栋

专家简介：

郑其栋，1935年生，山东高青人。1958年8月—1961年1月间，先后两次赴青海做民族社会历史调查。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，曾任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、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。合作出版著作：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探讨》、《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》、《民族工作四十年》、《西藏今昔》、《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深化与发展》等。公开发表文章数十篇。

青海调查组人员构成：

组长：陈永龄教授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

副组长：白全 青海省政协秘书长 党员

成员：

姚乃青（女） 历史系教师

李凤珍 历史系研究生班学生

果鸿、温华、王时进、陈连开、李万良、郑其栋、常惠

明、陈乃文等历史系二年级学生

历史系一年级学生 10余人

政治系老师 3-4人

马少兰（女）、哈培玉（女）等政治系学生 约10人

李源、李红斌、宋仪（女）等北大历史系学生 约6人

钟子林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

西北大学学生 1-2人

翻译，主要为青海民族学院藏族学生

下设6个小组：

海北组：负责调查藏、蒙、回族情况

海南组：主要调查藏族

黄南组：藏族

海西组：藏、蒙、哈萨克族

互助组：调查土族情况，编写土族简史简志

循化组：调查撒拉族情况，编写撒拉族简史简志

果洛组：海北、海南、黄南、海西四个藏族调查组回到

西宁后，又于1959年1-4月赴果洛藏族自治州调查。有果

鸿、温华、王时进、陈连开、李万良、郑其栋、常惠明、

陈乃文等约10人左右。

（以上据郑老材料整理）

记：郑老师您好！请您讲讲1950年代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经历。

郑：1956年前，毛主席就有个指示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要抓紧收集资料，要不然，民族地区一搞社会改革，过去的一些社会历史情况就没有了。所以要赶紧做社会历史抢救。1956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为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，就组织了八个调查组：内蒙、新疆、西藏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。原定用4-7年完成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。但调查刚做两年就到了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候。各行各业都要大跃进，民族工作也要大跃进，首先从社会历史调查开始。所以，1958年7月份，民委党组就给党中央写了报告，说为了抢救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物社会情况，要做社会历史调查（原文如此——编者注）。

当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有一个1956—1966年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》。这个规划里提出来搞三套丛书。就是少数民族简史、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。

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。当时为了给十周年献礼，通过这套丛书反映建国10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，反映各族新的面貌和各族之间新的关系，同时阐述党的民族政策，向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、爱国主义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，这个调查任务就扩大了，又增加了八个组：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福建、湖南，这就由8个组扩大为16个组。

这次要对50多个民族进行全面调查。全国新抽调研究人员、教学人员和学员400多人，原来的8个组充实了一些，大多数都放在新的8个组里。调查组所在的省、自治区都要抽调当地民委、民族学院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的干部、研究人员、教员、学生参

加。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担任组长或副组长，北京去的同志同时担任组长或副组长。……

记：调查组怎样活动呢？

郑：我所在的青海调查组全称是青海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。青海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幅员大省，面积有72万平方公里，就是相当于浙江省或江苏省七个左右。有的一个州就达十几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东部沿海地区一个省。它面积虽然那么大，但人口只有150多万。1958年我们去的时候，当地主要有汉族，藏族，回族，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，比如土族，撒拉族。汉族、藏族和回族加其他的少数民族，人口各占1/3即50万左右。藏族地方的面积很大。当时有6个自治州：海北、海南、黄南、海西、果洛、玉树。为什么叫海？因为几个州都围着青海湖，所以按方位取名。黄南就是黄河上游以南。海西原来叫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，现在海西州蒙古族藏族自治州。为什么把哈萨克取消？因而文化大革命以后，哈萨克族迁到新疆去了。哈萨克族原来就在新疆，所以族内有部分人要求迁回新疆，就把他们给送回去了。他们一些人回去以后，由于习惯青海生活，有的又回来了。

青海这个组调查任务相当繁重，除了调查还要承担土族和撒拉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。另外当地的环境恶劣，这就不细说了。总之，青海组人比较多，大约40多，女同志有四分之一。当年除了陈永龄教授40多岁，其他都是20-30岁的青壮年。

当时我在海北组，负责藏族、蒙古

族。海北去了有五六个人，两个历史系的，北大一个，还有政治系一个同志。他负责调查蒙古族和回族。海北州委所在地是湟源回族自治县，那里有回族。我们这个组有两个藏族的翻译，都是青海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。

……

记：您具体讲一下调查工作的程序吧？

郑：青海调查组第一阶段（1958年8-12月）共分四个小组，调查四个州的藏族。回到西宁后，把四个报告综合在一起写了青海省藏族的综合报告，但里面没包括果洛和玉树。这两个分报告送到四川组，供他们编写藏族简史简志用。

调查路线是这样的：西宁下去先到海北，再到门源县，当时没有班车。我们没办法就到邮局，等着坐人家的邮车去海北。这样耽误了好几天。

当时的邮车都是大卡车。我们几个人坐着先去给海北州委报到，汇报我们来的目的和调查的对象，请州委给指示，看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做调查。州委很支持，建议我们这个藏族小组就去海北州的刚察县和海晏县。去海晏县还得经过西宁，我们又等了几天借了一辆车回到西宁再找去刚察县的汽车。等了几天也没有，邮车也说邮件很少到刚察去。这样又等了几天。当时调查时间安排都有规定，所以青海民委就用个吉普把我们几个人给送了一段。路上有一条河没有桥，有辆车掉到河里出不来，我们还得帮忙把车拉过去。当时是上午走下午就能到刚察，大概也就百十里

地。到了刚察县，还是按程序拿着省委统战部和海北州委和开的介绍信，先到县委汇报，由县委确定到哪个公社调查，我们就去了。到了公社也是人家给你安排哪天开座谈会，哪天访问什么人。总之都是按照我们的提纲，由人家给找人找地方，不是我们说了就算的。

记：当时座谈和访谈的都是什么样的人？

郑：那时候都是“贫牧”。这个词是从“贫农”那儿来的。要是了解历史情况什么的，就找年纪大的，稍微有点文化的，找点老的喇嘛。座谈基本在寺院里头，当地喇嘛才有点文化，一般的牧民不读书不看报也没有广播，跟外界基本没有联系。我们还碰上一个牧民问我们，说现在是什么皇帝当家？我们说皇帝打倒了，现在解放了，毛主席当领导。哦，毛主席当皇上啊。他还是那个清朝的老观念，也不知道你共产党是什么，毛主席是什么。

记：调查的内容呢？

郑：当时的主要调查内容都根据纲要，基本就是：

1、概况，包括行政区划、人口分布、自然环境、山川河流、气候条件、物产资源等。

2、历史概况，包括青海藏族来源、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青海藏族情况、藏族社会封建化的情况，青海藏族近代和现代的情况等。

3、解放前的社会面貌。农牧区生产资料的占有、生产力发展、商品交



青海藏族马上拾哈达比赛

换、封建剥削、封建政治统治、千百户统治、部落之间械斗、马步芳政权的统治等情况。

4、宗教信仰、宗教剥削压迫情况。

5、封建制度下文化艺术情况。

6、婚姻家庭、风俗习惯、禁忌等。

7、教育、卫生、衣食住行。

8、农牧民的反抗斗争。

9、青海藏区的解放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现。

10、解放后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。

11、解放后文化、教育、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。

12、民族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。

13、对民族宗教上层统战情况。

14、平息部分地区叛乱情况。

15、青海藏族语言文字情况。

我们是协作组，就是根据写作单位需要的材料做调查并把材料整理好，写成调查报告送到编写组，让他们去编写。编写组的调查还要更细致。

藏族简志是四川调查组负责编写。他们要调查四川甘孜、阿坝藏族地区的情况。还有甘南州，青海六个州，云南藏族自治州，各省调查组完成调查报告都要送到四川供他们编写藏族简志。藏族情况特别复杂，分

布面积特别大，各地情况大不一样，所以当时出了上下册。下册因为青海有特殊情况，叛乱还没完全平息，他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跟民主改革一块搞，所以青海的情况他们也不好写，也拿不准。现在经过改革开放，都知道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改造是错的了，也就是都不写了。但是我们调查的时候还是按照青海省的看法写的。……

记：都是统一的还是个人进行的？

郑：都由组里来定。比如调查了三个问题，我整理哪一个，你整理哪一个，这样分工。翻译晚上都休息了，我们这些人就去整理。调查完某一个点，比如刚察县这个藏族调查报告，再把情况综合起来。全县没有去调查的地方，你还得找文字的材料，收集一直人家过去搞的调查，补充到你的报告里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。写完要送到县委去审查，县委得同意。你写得合适的地方，人家就提出来让你改。他认为你夸大的、写得不够份量、不该说的，都给你提出来，这也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。他同意了以后我们就拿回来了，拿到州委去汇报。州委说县委看了我们就不看了，这些情况基本上了解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。回到州上还要开总结会，把调查中的成绩和不足都总结汇报一下，各小组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互相提意见什么的。……

记：有没有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，或者说走些弯路之类的？

郑：弯路倒没有。我们这个组的困难就是一些比较深的问题，特别是一些历

史情况，很难找人了解。多数牧民没有什么文化。他们跟蒙古族不一样，对青海藏族的历史，了解得不太清楚。比如刚才说的哈萨克族什么时候来到青海的？为什么来，又是什么时候走的？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清楚。青海是个很古老的地方，过去汉朝在那里就有驻军，以后羌族比较多。后来吐蕃又住在这块。明清主要是蒙古族在那里占统治地位。可是清朝后期，蒙古族也在慢慢地消失。解放后，只剩下一个蒙古族县了。当地蒙古族基本上都融合到藏族里面去了。土族也是蒙古族演变的。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，留下了一部分的蒙古人变为土族了。撒拉族是回族演化来的，风俗习惯各个方面都和回族接近。我们当时对这些历史情况调查了解得少，编写青海藏族简史简志还是得查一些汉文资料，只靠当地调查的远远不够。

再一个困难是我们对一些问题拿不准。比如说民主改革，社会主义改造放在一起搞。青海牧区合作化还没搞就搞这一个人民公社？我说这样一个笑话，1958年，果洛州的一个红旗公社书记有一天要开大会。结果等人一到齐，书记就站桌子上准备宣布我们进入共产主义了，已经搞集体食堂了。食堂的管理员说：书记，咱们中午没吃的了，酥油糌粑没有了，是不是再杀点儿牛给大家吃饭。啊？中午都没有吃的了？这个书记说，你稍等等让去看看。书记看一看确实什么都吃光了。书记一想啊，我过去也学了一点马列主义，知道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常识，是要让农民有衣穿，有饭吃，各取所需。中午都



青海土族一家几代人喝着奶茶尽享“天伦之乐”（许应华 摄，2004年）

没有饭吃了能叫共产主义吗？连社会主义也没有达到，连一般的自给自足，或者是丰衣足食都没有做到。于是书记又一上桌子，说今天会不开了，我有事。今天咱们还没到共产主义。这是果洛州委一个叫陈建民的书记跟我说的。他说我们人的头脑都发热，果洛也是一步登天，不过他们没登上去，连叛乱都还没平息。这都是当时调查存在的问题。

记：再给我们讲讲第二次去的情况吧？

郑：第二次调查的时候不是要搞民族工作大跃进吗！原来打算国庆十周年的时候，写出三套丛书来给国庆献礼。结果到了1959年9月份了，好多调查组连简史简志都写不出来，初稿都没有完成，大部分是到了年底才写成初稿。当时民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春主持工作，主任乌兰夫不在北京。他听了汇报，也看了一些简史简志的初稿，认为写的不怎么样，里头浮夸的东西，错误的东西都特别多，材料也缺的很多，这就当然出不了，初稿写不出来还献什么礼？民委决定1960年再下去调查。就是调查报告、简史、简志，继续改，继续补充。所以1960年4月份就组织了第二次调查。基本上还是原来在哪个组就回哪个组，有的人提出换组也可以，但是变动不大，基本上是原班人马去的。另外北大历史系的学生，有的快要毕业了，人家也不去了。别的大学的一些同志有的也不去了。像中央音乐学院，第二次也没去，人数反正比第一次少了一些。第二次去又发了那个棉大衣，皮大衣什么的。这次就

是去做重点调查。我还到了那个土族自治县去调查。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。我到的土族自治县已经好长时间没粮食吃了。我们去时拿的是民族研究所发的全国通用粮票，寄到各个组，我们按北京的标准，每天是一斤粮食。那时学校都比较高，比机关干部都高，记得我的定粮是31斤，按说够吃的，我饭量不大。结果我们交给这个土族自治县的一个公社食堂，一天交一斤粮票吃两顿饭，什么样的两顿饭？就是两碗麦子杆压碎了做成的糊糊，上午一碗下午一碗，就是这样的生活。这个公社每天至少要抬出十几个人，都是饿死的。当时青海省委一个组织部长，还在那里开批斗会，批斗一个生产队长多分了一斤多土豆，说这是贪污盗窃公家的土豆，问他贪污了多少？他说也就是四五个吧。那部长说那估计一斤多，该当何罪？生产队长说你们看着办吧，我当时我就是称得高了一点，大概就多分了一斤多土豆，现在想起来是很辛酸的。1960年，青海已经是不可收拾了。

记：第二次做了多长时间？

郑：不到一年，1960年五一前去的，61年1月份就回来了。

……

记：调查材料怎样整理的呢？

郑：我的调查材料、笔记本和整理的稿子都交了。按规定都要交。我们回北京就是不带任何材料。调查报告写好了更要交。一个是交到编写组，蒙古族的交到内

蒙，哈萨克族的交到新疆，回族的交到宁夏，藏族的交到四川。但所在的县、州和省里都各留了一份。1980年的时候这个综合报告青海也出了。

记：后来你写过这方面的书吗？

郑：没有。我记得1959年青海组集体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牧区的宗法封建制度，登在《民族研究》上。青海是“千百户”制度，类似土司制度，就是有大千户小百户。一千户是一个部，下头管一百户，但是数量不一定，有的一百多，有的一百少，有的一千多，有的一千少。我去刚察县，县委所在的地方就是个大千户。这个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，牧民把人给斗、打死了。有的大千户没有叛乱也打死了。久治县的康克明，康安庆都是大千户，至少要管一千户人家。这个康克明叛乱的时候，问当地的共产党干部，他说你们中国大还是我果洛大？我果洛能出两千骑兵，你们中国有吗？这些人解放后，要他们参观访问，全国到处转。出来转的人对国家的情况才有所了解。有的人请他出来也不出来，那笑话就多了。另外1961年，我们班集体写了一本《中国少数民族简史》作为毕业论文。人人有份，人手一册。

记：当时调查遇到什么至今难忘的事情或人吗？

郑：一时也想不起多少来，因为时间过得太长了。1959年春节期间，到果洛去一个公社调查。到春节了，牧民也没有吃的，我们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吃饭，我们去



青海金星农业社和香水农业社的回民在一起欢度尔德节（买世杰 摄，1956年）

做调查，不仅吃的没有，烧的也没有，我们到那个公社食堂里去，食堂的领导对一个藏族女同志说，你到山上去砍柴来，我们烧火没有柴火了，就有一点牛粪。这个女的就上山去了。一个女同志在雪地里头，零下几十度，人家砍了一两个小时，就回来了。后头背着一捆柴，前头抱着个娃娃。领导说你从哪儿捡了一个孩子？死的还是活的？她说当然是活的了，我刚生的。去的时候没有，砍柴的时候突然就是要生了。女同志自己在外头生了，就把自己皮袄脱下来，抱抱，继续砍，砍了一大捆以后，用那个皮袄包着小孩，后面背着一背柴，就回来了。我们都觉得太不可想象。当地人那么艰苦，那么勇敢。结果大概杀了一头牛，煮的一大锅，我们一个人拿一块牛骨头。那天正是正月初一。人家不过春节，人家是藏族，我们从早上一直到下午，也是啃的牛骨头，这就算过年了。这个事说明到这些地区去调查相当艰苦，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。另外还说明后来为什么要解散食堂？确实食堂在牧区行不通，牧民不能接受。

记：您现在怎么看待和评价当年的调查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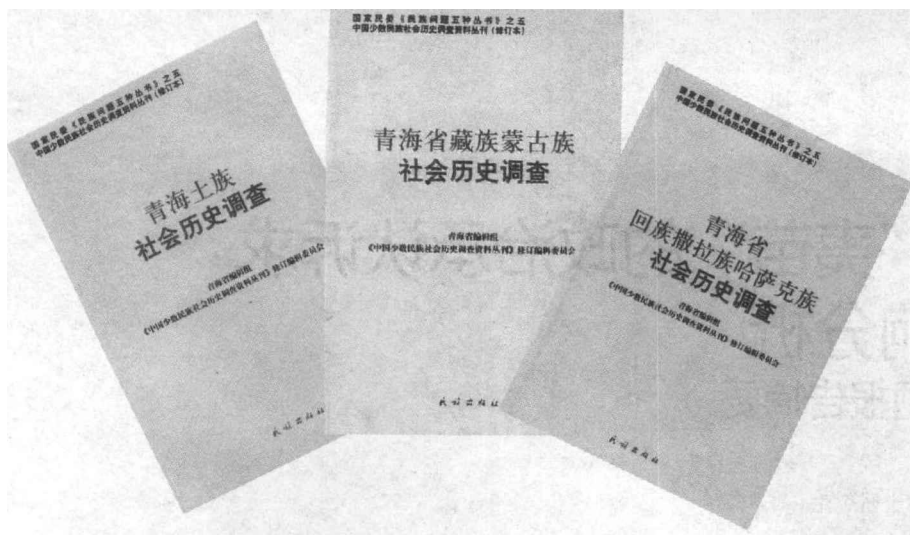
郑：当年那次大调查非常必要，也非常及时。再晚了好多东西更没有了。正如毛主席说的，就是抢救少数民族的社会、历史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情况。历史还好办，特别是一些政治制度，经济制度，这个生活习俗，文化方面的东西，还算抢救得比较及时。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由专门人才去调查，比如音乐、美术、舞蹈等

问题，我们组就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钟子林同志承担，当时收集整理了不少民歌。

所以这次调查意义重大。对以后的民族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。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，制定民族政策也好，了解民族情况也好，进行国际交流也好，和台湾的一些文化交流也好，都是拿着一个五套丛书和一些调查报告做参考。特别是这五套丛书，那世界各个国家都搞不到的，是非常好的材料。我们为各个民族写了历史，他们都感到骄傲，感到光荣。特别是有些近现代的材料，写了以后，对少数民族，鼓舞很大。你只有看了这些材料才能够体会到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共同的缔造，党的民族政策是一贯的，我们中国共产党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民族问题，在长征路上，一直到现在都是实现民族平等，团结一致。到了延安，也是积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，在延安成立了民族学院。咱们这个民族学院也是延安民族学院的继续。现在延安民族学院又恢复了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这次调查，对于推动民族团结，振兴爱国主义，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教育都起了很好的作用。特别是近现代，好多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物，爱国人物，抗日英雄，“一大”有一个侗族的代表，写了好多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物，这个谁看了都很受鼓舞，很受教育。

但是它毕竟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搞的调查。大跃进时代到处吹牛浮夸、极左，这一些在调查报告、在书里头也都有反映。这些东西都是错的。特别是青海搞的“一步登天”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一步

走，那些都是错的。还有青海的牧区开荒，以粮为纲，把很好的草原都给改成田地种庄稼。你想那个树都不长，只是长出来草，那庄稼能种吗？那个无霜期很短，怎么能长出庄稼来？开荒的地方后来连草都不长了，几百年的草，几十年的草都给它用拖拉机都给它耕了压到底下，长不出草来了，破坏了生态平衡。有的地方气候比较好一些。比如久治县，有一大片山沟里头，地势很平坦，就开始种麦子。我都去看了，六七月份才长出麦子苗，人家农业专家看了看，说这个不可能结粮食，不可能出穗，生长期不够。当地干部就在这个周围都放上牛粪、树枝，准备下霜的时候就要点火，我说你有多少牛粪树枝烧啊？结果破坏特别大。过去青海的水源丰富，草场长得挺好。后来我去，好多地方成了荒漠了，再一个是牲畜也多了，草场不够吃。青海过去草场是共有，随便放牧。只是牲畜在千家万户。牧主的多些。贫苦牧民有的没有就当牧工挣口饭吃，或者牲畜特别少。三中全会以后出的这个五套丛书，虽然经过当地修改，我翻了翻有些浮夸的东西还是在，比如说人民公社还是有所反映。我在政策研究室的时候曾经跟赵延年商量并写了报告，准备再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调查，把现实的情况也写出来，作为各个部门，制定方针政策给中央国务院做参考。当时写那个报告，经费预算相当大，上亿，结果大概中央没批，后来退了，这项工作也没有搞成。结果这些年的民族工作还是吃早年那些剩饭，一直吃到现在。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一部完整的社会发展史，对于世界各国都有借鉴作用，都是很好的。要是认真的写成东西，



很有价值。还有最有价值的，就是第二次调查带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人去，有几个组拍了一些民族解放前夕的社会情况，包括经济情况，政治情况，风俗习惯等等。让当时了一些农牧民穿上解放前的衣服，用的工具，或者原始社会末期的那套装备，或者是农奴制时代的袜子、戴头、手铐，劳动情况，各种情况，都拍了不少片子。比如海南黎族的“合亩制”，这些拍了好多，这些最有价值。那个是拍的真实的画面，你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时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，社会情况，生产情况，。

比如他们的交换，一个部落拿两只鸡放到路边上，人藏起来，另外一个部落挑上一些水果，也放到路边上，把中意的东西互相拿走，这都是以物易物的交换。蒙古族封建社会比较发达了，但习惯上看不起商人，不愿意做买卖，有的人卖豆腐，自己晚上起来磨的豆腐，早晨他自己不挑出去卖，找个汉族挑着担子，他在后头敲着梆子，汉族人吆喝。赚了钱是他的，给汉族人一点。就是这样，他认为做商人投机倒把是很不光彩的事情。云南的景颇族，比如卖一只狗，绳子一头拴着狗，再一头拴到自己的腰上。人家来买狗，把他腰上的绳子解下来，给他十块也好，五块也好，人家把狗牵走了，钱放旁边。他们的货币观念很淡薄，反正我这个狗没白牵走就行了，留下点钱就成。不会做买卖，所以，人虽然到了社会主义里面了，但是这个思想意识形观念，不会很快的变过来。所以这些都需要认真的做民族工作。

当时由于时间紧，赶任务，调查做的

不够深入细致。有些就是听信别人说的情况。比如人民日报登出海西小麦亩产8400多斤，我们当时信以为真，后来才知道是他们把很多小麦堆在一起凑起来的。

再一个就是培养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，少数民族地区知识分子毕竟有数，一个县有个大学生就相当不错了。人家花了很多的钱辛辛苦苦来培养，结果毕业后，好的首先混到中央，然后再到省，再到地、县，到县就没有，人家就白培养了。我们当年这个调查，至少让像我们这样的大学生经受了实地的锻炼和学习。后来的一批民族学者都是参加过当时的调查工作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应该继承。

记：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，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，祝您健康长寿幸福。

（责任编辑：任福佳 孟洁）